

# 论文化软实力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影响

□ 孙 丹

**摘 要:**抗日战争是中日双方国力、军力对比悬殊的一场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坚韧不屈地抵御外侮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付出了3500万同胞的生命与血肉。这个胜利也是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血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诞生的新文化所创造的胜利。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随着战争的脚步成长壮大,终成浩荡之势,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文化软实力在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军事、政治力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战时的文化建设以及宣传教育功不可没。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抗日战争 人民军队 新民主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5)04-183-06

国家“软实力”的概念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sup>[1]</sup>但是文化“软实力”一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强国之间角力的重要砝码。对于东方大国中国来说,无论是在万众一心追求民主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还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坚韧不屈、同仇敌忾地抵御外侮、寻求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中,文化“软实力”都发挥着增强国家凝聚力、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作用。

早在70年前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特点。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在与侵略者、当时的东方强国日本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精神”和“文化”这一“软实力”的较量,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之势,无惧强敌,勇担民族大义,坚定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全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感召并凝聚海内外爱国同胞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友人,参加到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烽火

连天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几万人壮大到百万雄师,既是战斗部队,也是出色的文化大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战斗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战争的脚步,从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 一、“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sup>[2]</sup>

抗战初期,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几十人,已经发展成为有几万名党员及几万人军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政治力量。此时,共产党已经在右倾和“左”倾路线的挫折中探索并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正确的路线,明确提出了抗战建国的目标。在思想文化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已具雏形。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地区,围绕

\* 作者简介:孙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0。

根据地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教育的实践。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中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慷慨悲壮的口号,拉开了战时文化建设与宣传教育鼓动的序幕。《指示》要求各地用宣传标语及群众会议等方式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同时以此口号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要求平绥平津地区、平汉线津浦线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sup>[3]</sup>7月14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要求红军将士做好政治和军事准备,随时奔赴前线。

1937年8月1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利用公开环境,加强“对于友军和地方居民工作,……采取完全公开的方法,在友军中居民中进行各种宣传工作,进行上层与下层的公开活动,用联络联欢参观等等方式,在友军中居民中广泛散播党的主张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实现民主的重要,号召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并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他们,团聚他们。”<sup>[4]</sup>不久之后,著名作家丁玲、吴奚如、史沫特莱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奔赴前线。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欢送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你们要用你们的笔、你们的口,与日本人打仗。……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sup>[5]</sup>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改红军为八路军的命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在重要城市相继失守,日军向中国内陆迅速推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和意图速胜的骄狂,特别是面对中日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则利用这种情绪,散布妥协退让的假和平意图,以此动摇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真正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战场上的胜利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之外,就是必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彻底、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教育,动员和争取一切力量投入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9月,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会议上,指示各师旅政治部,要公开宣传动员群众,扩大统一战线,使共产党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sup>[6]</sup>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在华北创建根据地的具体部署。<sup>[7]</sup>随后,八路军按照中央和总部的部署,在华北、华东的广大地区积极

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卢沟桥事变后,仅7-12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总政治部就密集发出了十几个宣言、命令、指示等,誓言巩固国共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其中均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演说,申明抗日主张,尤其重视党的领导及部队的政治、宣传等工作,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和部署。11月25日,苏联和欧美记者到访山西省洪洞县高村,朱德和任弼时向他们作了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sup>[8]</sup>中共中央公开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创刊后<sup>[9]</sup>,更是成为共产党宣传抗日主张、教育人民团结抗战的重要阵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的重要主张,对抗战时期文化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关于宣传的目的,报告提出,全民族比以往更为重要的第一任务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艺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sup>[10]</sup>

关于宣传的内容,报告提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生,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sup>[11]</sup>

关于抗战教育政策,毛泽东提出了战时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是在他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提出的。毛泽东提出,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就必须有适应战争原则的教育。因此,毛泽东提出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全方位的文化教育的构想“第一,改订学制,……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

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sup>[12]</sup>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对抗日战争新形势提出的新政策和新策略,也标志着党对文化教育宣传问题的思考,正在从战争初期抗战救国的宣传性的战时动员,向抗战建国的具体目标、向全面建设和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转变。随着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在各个敌后战场的征战,一场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和新文化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二、人民军队成为抗战文化高效率的播种机和宣传队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像今天这样的舆论宣传硬件网络是不可能的。但是共产党充分发掘、依靠和运用了战争中的人和人、人的精神意志这一软件,以根据地为依托,充分利用流动的战斗部队的力量,建立起了无所不在的战时文化教育和宣传网络。与中外历史上的军队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战斗部队,也是政治部队、文化部队;全体指战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抗日战争时期,以八路军为代表的人民军队既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八路军与各种专门的宣传机构、团体一道,承担了宣传教育、发动民众的重任,唤醒和凝聚了全民族不可战胜的斗志和力量。“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sup>[13]</sup>

利用和依靠军队执行对群众进行文化宣传教育的任务,既是客观需要,也具备这种可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身就具有宣传队、播种机的优良文化传统。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了红军在长征途中传播革命火种的伟大壮举。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亲自为杂志撰写了发刊词“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3月19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各政治机关,要求他们给《八路军军政杂志》新设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专栏提供抗战中涌现的民族英雄事迹材料,除在报纸上发表,并择其最重要者广播。

抗战八年,八路军的抗战足迹遍及晋冀鲁豫广大地区,

从几万人发展到百万大军。抗日根据地的扩展和八路军队伍的壮大,本身就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教育宣传的结果。

八路军自身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是他们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基础。部队执行政治任务就是一切“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在抗战中的胜利。这一工作(指政治工作)不仅在未加入作战前的每一分钟去进行,特别要抓住抗战中的每一空隙去实现。”<sup>[14]</sup>八路军以根据地为依托,利用战争间隙,对部队指战员进行军事技术训练的同时,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十分坚强有力。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场,说明赢取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持久战争的艰巨性、复杂性。《战斗日报》、《新华日报》、《胜利报》等报刊在战争时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出版发行,“在军队中,每团有一个报纸”,在每个村,都有读者联合会<sup>[15]</sup>,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及时地传递到每一个战斗部队、每一个根据地的村庄。

在抗战文化的建设中,知识分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加入,不仅使革命队伍的成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大大提升了文化教育活动的水平和质量。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投向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这件事本身,也证明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吸引力。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共产党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部队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也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共产党的队伍仅仅只有军事政治干部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经济、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所需的人才,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人才。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和《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不仅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还先后创办了几十所高等、中等军政干部学校、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学校内普遍设立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自己的知识分子,为部队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宣传教育运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察冀边区,专业文艺队伍就有3000多人,专业剧团四五十个,文艺、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戏曲、曲艺、摄影、电影队、军乐团等文艺的各种行当齐全。业余的村剧团则有3000个,加上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的业余文艺团体,有10万文艺大军。<sup>[16]</sup>文学活动方面,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sup>[17]</sup>一书的编后记中,编者介绍,他们在编撰该书时披阅了包括铅印、石印、油印的近200种报纸、100种期刊。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共产党报刊是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这些显然不是当年所编辑印制报刊的全部。<sup>[18]</sup>在该

书编制的1937年7月-1945年9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事记中,记录了不少报刊,其编辑出版时间很短,有的几个月就终刊了。但是可以想见,虽然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文化工作却是有声有色,部队和根据地文化生活相当活跃,特别是创作周期短且易于传播的诗歌、秧歌、民歌,宣传画、木刻、炭画、年画、漫画、雕塑、墙画,话剧、活报剧、歌剧、儿童剧,京剧、河北梆子、秧歌剧、山西梆子哈哈腔等新编地方戏曲,拉洋片等等,作品十分丰富。

抗战戏剧运动入到每个乡村,各地的戏剧运动也结合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蓬勃发展。1939年7月7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发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成立宣言》,号召边区的戏剧工作者“一切是为了抗战,一切是服从于抗战”,“开展新剧、活报、儿童戏、子弟班(即旧戏班),使一切新旧剧都为抗战建国的事业而服务。”<sup>[19]</sup>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艰难的时期,党一方面更加加强对部队的思想纪律教育,克服对残酷战争的消极波动情绪,时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危,与人民群众共克时艰;另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教育,使人民群众成为八路军坚固的后防堡垒。正是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惨烈的时期,根据地涌现了无数军民血肉相连、壮怀激越的慷慨悲歌!当时和后来创作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吕梁英雄传》、《荷花淀》、《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苦菜花》、《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峥嵘岁月。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抗日活动的描写,既反映了战争中无人能够幸免的残酷性,同时,人人参加抗战的描写也表现了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燕京大学逃到根据地的英国友人林迈可,在战后出版的书中对此仍记忆犹新。书中记载,1942年1月,林迈可夫妇来到平西根据地,根据地政府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会上有地方群众代表讲话,对打败日寇极有信心。林迈可惊异于中国穷乡僻壤之普通百姓而能谈抗日国事,且政治意识如此进步。<sup>[22]</sup>而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档案记载,1935年时,涿县西部山区野三坡居民“男子未剪发者,尚居半数,妇女均缠足,其头足之装束甚古……教育虽有学校,亦甚幼稚,课程不外三字经百家姓等书。”<sup>[23]</sup>

战争年代,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被运用到极致。“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而“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sup>[24]</sup>短小、通俗、寓教于乐的文艺作品在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团结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时期,很多优秀作品正是随着共产党的战斗部队、文艺团体,传遍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甚至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地区。

在战争的硝烟中,不但生活在延续,而且生活的方式发生着积极的变化,新的社会理想在新的生活中培育成长。共产党及其军队,正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了自己、唤醒了民众,与百姓建立了鱼水深情,成功地实施了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思想教育。根据地的百姓怀着对新生活的期望和梦想,心甘情愿地倾其所有、倾尽全力支援了抗日战争,支援了子弟兵,成就了共产党,使日本侵略者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至于灭顶”。可以说,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一道共同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 三、和平年代,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战争时期,文化则是一种战斗力。

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为经济、军事实力,还表现为文化实力,是谓硬实力与软实力。而文化实力不仅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还表现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因此说,在和平年代,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文化的影响力是通过庞大的机器生产和资本运作来实现的。<sup>[25]</sup>而战争时期,对作用于人的意识和精神的文化力量的争夺,则使文化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力量。物质力量固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但是物质力量的对比,更是人力的较量,是意志和文化的对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度过战争初期惊心动魄的鏖战、战争中期令人绝望的相持,以及坚持到战争末期人力物力几乎消耗殆尽的决战,并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应该说正是各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凝聚和鼓舞了弱小民族的信心和勇气。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为突出。针对亡国论和妥协论者的“唯武器论”,毛泽东在战争初期分析抗日战争的未来前景时就特别指出,我们“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sup>[26]</sup>“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头野牛就非烧死不可。”<sup>[27]</sup>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除了武装侵略,也展开了文化的攻势。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依靠文化工业,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化扩张的情形不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是在武装侵略开路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侵略,是在公然毁灭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摧毁中国的文化机关,掠夺、焚毁中国的文物和文化典籍,拉拢、监禁直至屠杀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同时建立大批由日本人控制的文化机关,豢养汉奸

文人鼓吹“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在日占区,侵略者强行在中小学中使用日本教科书,由日本人用日语授课,逼迫学生只说日语。在冀中冀南各地,日军在他们散布的报纸和宣传品中,利用各种宣传手段,“麻醉我同胞,诱惑我青年,把我们的儿童运往日本等等”。<sup>[28]</sup>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日伪在据点岗楼及所控制的村庄中强迫成立小学校,通过“大乡”登记儿童,并指定各村保送适龄儿童去上学,在学校讲授日语和伪课本。此外,在社会上出版散布载有奴化思想内容的旧剧、电影和报刊图书,组织武装宣传队——宣抚班,对平民百姓进行奴化教育。这些文化侵略的行径,无疑是想以奴化运动和奴化教育从思想意识上来瓦解和毁灭中华民族的家国传统和文化认同,实现文化征服的目的。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这种意图更加突出。

因此,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奴化与反奴化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的战时国民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在指示部队文化工作时也指出“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提高其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sup>[29]</sup>在华北广大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普遍设立了民革室<sup>[30]</sup>。陆定一在 1939 年 4 月 9 日发表的给《新华日报》(华北版)所写的专论《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中,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了民革室的五个任务,非常具体,内容也十分丰富。<sup>[31]</sup>

“使用一种语言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割断一个人与母语的联系,也就意味着使他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断绝了联系”。<sup>[32]</sup>因此,奴化与反奴化教育成为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史上不亚于军事战场的一场文化战争。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广泛发展民众教育”,“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的战时文化教育方针,<sup>[33]</sup>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写了大量课本、教材形式的通俗读物,如群众教材、干部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老百姓通俗读物(日月杂字、农村应用文)等。供学校使用的课本如儿童启蒙教材(谜语、三字经、日记)、小学教材(国文、历史、地理、卫生)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增加了政治教育和抗日宣传的内容。如边区高级小学《地理课本》第一册中,有一课名为《惊天动地的变动》,内容是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事情“土地分了,土豪打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费打倒了。政治变成民主的,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做官的只给大家工作,再不像以前抖什么威风。各处都训练自卫军,以抵抗敌人和查拿汉奸。”<sup>[34]</sup>

共产党八路军在与日伪军武力交锋的同时,展开了针

锋相对的反奴化教育运动。八路军一方面成立抗日学校,如抗日伪装小学和抗日隐蔽小学。前者也叫抗日两面小学,即学校外表跟敌伪统治的学校一样,但校中有两部分教师——抗日教师和“应敌教师”,敌人来时由应敌教师应付一下,敌人走后再换上抗日教师。后者也称地下小学,是在日伪控制区十分危险的环境下兴办的学校,寄托着共产党人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深切期望。另一方面,针对日寇配合“三光政策”进行灭绝民族意识而在根据地边缘地带及广大游击区实行的“大自首运动”,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1942 年 1 月,边区各地村庄普遍举行宣誓仪式。同时,在儿童中开展“五不运动”,要求儿童团遵守“五不誓约”。八路军和根据地政府组织群众把“军民誓约”写在各村的墙上,让群众诵读。<sup>[35]</sup>天真无邪的儿童也在战争的险峻环境中少年老成起来,加入了庄严的抗日盟誓运动。

“军民誓约”的内容是:我是中国的国民,我是中国的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愿意遵守军民公约如下宣誓:(1)不做汉奸顺民。(2)不当敌伪官兵。(3)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4)不替敌人汉奸做事。(5)不给敌人汉奸粮食。(6)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7)不用汉奸钞票。(8)爱护抗日军队。(9)保守军事资财秘密。(10)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以上誓约,倘有违犯,愿受军纪法令制裁。

儿童“五不誓约”的内容是:(1)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2)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3)不报告地洞和粮食。(4)不要敌人东西,不上敌人当。(5)不上敌人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

“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sup>[36]</sup>从后来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始终能够看到,反奴化教育运动在那个年代的人的头脑中是留有深刻的烙印的。如果说暴力侵害的是人或者说是国家的肌体,而思想、文化的奴役和征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而言,对文化之根的毁灭都是致命的,然而又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不仅是民族危急关头的救亡运动,也开启了古老华夏民族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诞生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文化和新价值体系。因此,抗战教育运动无疑也是一场伟大的现代启蒙运动。党和军队所创造和传播的革命文化,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以这种崭新的文化,塑造了新型的国民。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37]</sup>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在中华文化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和打击的情况下诞生的,这种新文化继承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战斗性。因此,这是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先进的新的文化支撑起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和生活的信念。当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价值观念掌握了亿万军队和民众时,就成为无所不在、无形却有巨大威力的、堪比先进武器的实力,成为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在争取民族独立、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这种信念和精神的力量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这些掷地有声的誓言,与那些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勇士们,已经深深地镌刻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也深深地融入了滋养我们心灵的灿烂文化之中!

#### 参考文献:

[1]“软实力”和“硬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其著作中提出。原文书名为《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中文译名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2004年,约瑟夫·奈又明确界定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

[2][10][11][12]《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605、606、616、42页。

[3][4][14][15][2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40页。

[5]《作家丁玲史沫特列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新中华报》1937年8月19日。转引自秦林芳《丁玲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6][8]李志宽、王照骞编《八路军总部大事纪要》,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7]一二九师深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根据地。李志宽、王照骞编《八路军总部大事纪要》,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9]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

[13][美]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16]刘沛《晋察冀的文艺运动》,《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

[17]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

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据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藏有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刊、书籍达400余种,并在该馆文化长廊中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同类纪念馆中别具特色。

[19]胡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202页。

[20]《孙犁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7页。

[23]华北中央局材料《马江村一般概况》,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585-1-4-5。参见郭赞林的《战争中的乡村舞台——以1937-1947的晋察冀为例》,《沧桑》2008年第5期。

[24]《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25]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资本的流动,文化价值观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接受者的意识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年代里,文化的战争仍在延续,只是战争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26][27][36]《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511-512、48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5页。

[30]即民族革命室的简称,也称救亡室,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革室,有的地方则称救国堂。

[31]民革室的任务是:1、每天读报并讨论报纸上提出的问题。2、组织演讲,讲民族英雄故事、抗战故事、历史故事、生产生活常识,以及政府法令、国际国内形势等。3、娱乐和体育活动。4、扫盲。5、出版墙报。

[32]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33]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34]转引自周银霞《关于延安时期辛安亭编写教材和通俗读物的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5]反奴化教育的有关内容参考吸收了刘松涛《晋察冀的反奴化斗争》一文,载《老解放区工作经验片断》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禹兰